

经济逆全球化：现象、困境与对策

张广婷 刘涛

摘要：当下，世界经济与政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旧有矛盾如“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等被进一步放大，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南北发展冲突、全球经济治理等多方面现实困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应从推动创新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化发展等方面应对全球化发展的“逆风”。这不仅符合新时代回应新问题的现实需求，更是基于发展中大国的实践经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有益尝试，并为解决当下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经济逆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困境 科技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演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和世界潮流（刘坚和陈宝胜，2022）。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使得当下全球经济增长难觅动力，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更是难以为继。一是危机暴露出来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至今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例如，全球供求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TFP）趋势性减缓、全球劳动和资本收入不平衡趋势加剧、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困局等问题不断地侵蚀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力。二是贫富持续扩大和社会两极分化恶化全球需求格局，这

不仅是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更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各种逆全球化行为。三是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政策演进方向与经济增长结构性变化趋势不配套甚至是相违背。例如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产生“流动性陷阱”，还在加速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发达国家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国家利益优先、以邻为壑的政策设定，主导和破坏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冲击全球经济增长的罪魁祸首。亦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所言，“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破坏，将会重创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4%，60%的全球贸易

张广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涛，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流动性周期视角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与防范研究”[主持人：张广婷，项目批准号（19CJL049）]资助。



会消失”^①。

一、经济逆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 (Indermit Gill) 在 2023 年 3 月表示, 由于逆全球化现象, 全球经济可能接下会面临失去的十年^②。从经济全球化的三方来看,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利益机制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 中国采购原材料国的资源, 原材料国采购发达国家的科技。然而, 原材料国、制造业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正被打乱, 这是经济逆全球化现象的重要特征。

(一) 经济逆全球化内涵特征

与经济逆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经济全球化, 两者的关系是“一镜两面”, 实践中, 经济逆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体现。最早提出“逆全球化”的学者 Bello (2004) 将其称作“去全球化”, 认为其与全球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相背离, 是一种重新赋权给地方和国家层面采取封闭和保守的行为, 并指出“去全球化”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并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以斯蒂格利茨 (2011) 与罗德里克 (2011)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存在逆转的可能, 主要体现为全球主义 (Globalism)

发展过程由强转弱, 其增长速度趋于放缓甚至停滞, 均可视为经济逆全球化的征兆。依据斯蒂格利茨 (2011) 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提高商品、劳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 使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结合更加紧密, 它的宏愿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贫穷国家而言, 它可以让他们进入海外市场出售自己的商品, 它会吸引境外投资, 从而用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新产品, 它也会开放边界, 人们可以到国外去深造或工作, 并将挣得的收入汇回来帮助他们的家庭, 资助他们的新业务”。由此也可以得出经济逆全球化的内涵特征, 即全球范围内商品、劳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放缓甚至停滞, 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结合的紧密度降低, 这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这三个相互依存的层面逐步体现出来, 最终会损害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有研究认为, 鉴于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因此经济逆全球化内涵更多体现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变化 (渠慎宁和杨丹辉, 2022)。

(二) 经济逆全球化的现实表现

在现实发展中, 经济逆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反面, 主要表现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量的下降、全球价值链的回缩以

① 人民日报钟声: 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EB/OL]. (2018-07-03) [2023-08-08].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n1/2018/0703/c1003-30106033.html>.

② 面临“失去的十年”, 世界经济出路何在? (环球热点) [EB/OL]. (2023-04-08) [2023-08-08]. <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3/0408/c1002-32659660.html>.

及金融监管的强化 (Bordo, 2017)、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Evenett, 2019) 等诸多方面。

1. 贸易和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趋势明显

一般情况下,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体现, 也是支撑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与此相对应, 国际贸易放缓甚至降低则是经济逆全球化的表现之一。虽然全球贸易增长曾被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扰乱, 但将近十年的外贸增速趋势性下滑, 不仅是经济危机带来的短暂冲击效应, 更可能反映了全球贸易的一种结构性改变态势。例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UNCTAD) 的数据显示,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国际贸易增速稳步上升, 2000—2007 年全球商品出口金额平均增速高达 12.1%, 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至新冠疫情突袭而至前 (即 2008—2019 年), 全球贸易出口金额平均增速仅为 3.4%。与此同时, 在三年疫情的影响下, 全球经历了疫情反复、俄乌冲突、能源危机、货币紧缩等从政治到经济的多重打击, 全球贸易增速更是呈现断崖式下滑。

与此同时, 近年来, 全球经济运行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放缓全球贸易增长势头。一方面,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滥用制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带来严重的蝴蝶效应, 冲击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另一方面, 全球需求势头减弱, 全球各国工资水平呈普遍下降趋势, 贫困和富裕两极

人口“急剧”增长, 成为打击全球消费需求进而影响贸易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 除去三年疫情的冲击, 在疫情之前,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开始呈现远低于历史水平的现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08—2018 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1.5%, 相较而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30 年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速高达 18.2%。^①

2. 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全球贸易活动的增长放缓, 将推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以邻为壑”、自私狭隘的单边主义政策将继续成为限制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全球化发展逐渐落入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陷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频繁利用加征关税和退出国际组织等手段挑战多边主义规则 (郑宇, 2020), 更是走向双边甚至单边主义, 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被修订为“美墨加协定” (USMCA) 等。事实上,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 全球贸易环境已经逐步转差, 各国 (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都在推出具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措施, 成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桎梏。有研究指出, 2009—2021年, 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数据流动、劳务移民等生产要素, 全球实施了35 389项政策措施, 其中, 占比高达81.4% (28 806项) 的贸易和投资措施产生负面效应 (Evenett & Fritz, 2021)。

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收入的两极分化。亦如罗德里克 (2011) 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言, “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工业革命初期, 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和最贫穷的地区之间的比例是2:1, 现在这个比例是20:1。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0:1”。这是因为缺乏管束的自由贸易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 随之而来的是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兴起, 该群体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协定, 成为反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鼓吹者 (赵磊, 2021)。与此同时,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突袭而至, 进一步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时缺乏韧性的事实, 进一步推高了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浪潮。

3. 全球价值链呈停顿甚至回缩风险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逐步下降态势已经凸显了经济逆全球化的典型事实 (Carvalho, 2015)。

一方面,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 经过30多年快速扩张的全球价值链增长出现停滞。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指出, 从衡量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指标——贸易中的外国附加值 (即一国出口中包含的

进口商品和服务) ——变动来看, 外国附加值于2010—2012年达到顶峰, 2017年在贸易中的比重已经降至30%, 与上一个十年相比,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所有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率都大幅下降 (UNCTAD, 2018)。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即GVC参与度) 指标来看, 以全球两个贸易大国即中美两国为例, 中国和美国的GVC参与度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开始下降, 呈现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 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国的GVC参与度也在逐步下滑 (渠慎宁和杨丹辉, 2022)。

另一方面, 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慧化趋势加快, 半导体产业的激烈竞争更是成为进一步撕裂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以美欧日韩等为代表的半导体大国相继推出新的半导体产业政策, 均在强化对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且政策上跟随美国的特征日益明显, 如美国于2022年8月生效和实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 2023年4月欧洲达成的《欧洲芯片法案》, 2023年6月日本发布修订后的《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 2021年5月韩国发布的《K-半导体战略》, 等等。由此可见, 全球半导体产业阵营化和分割化特点愈加凸显, 这可能会推高关联产业的生产成本, 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 也会扭曲芯片供应链, 引发全球半导体产业分工的深度调整, 导致半导体产业的生产 and 市场面临碎片化风险。

4. 地缘政治正逐步改变全球经济

现阶段, 地缘经济割裂呈现上升趋势,

经济全球化逐渐向经济区域化的方向演进，传统的区域间贸易和投资逐步向区域内转移。

首先，贸易伙伴的多样化程度下降，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正明显趋于“集中化”“友岸化”和“集团化”。联合国贸发会议2023年6月的《全球贸易最新动态》指出，2023年第一季度，影响全球贸易的政治因素开始加强，各国贸易趋于“集中化”，即更多依赖主要贸易关系，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动逐步趋向“友岸化”，即更多优先考虑转向具有相似政治立场的国家，并指出2022年第二季度至2023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依存度同比呈现下降态势，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同比下降2%，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同比下降0.9%；俄罗斯对欧盟下降5.6%、澳大利亚对中国下降2.2%；与此相对应的是，相同政治取向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同比显著增加，其中乌克兰对欧盟增长20.5%，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增长8.5%，俄罗斯对中国增长3.5%，加拿大对美国增长1.2%。

其次，全球贸易政策与安全逐步融为一体。全球许多国家和决策者都开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这体现在各项政策中，如供应链重构；在岸生产、产业回流或友岸外包等生产模式的推行；产业政策或大规模补贴的再度兴起；以及出口管制或投资审查^①。这些政策不仅会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较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同

时还可能造成某些关键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这不仅人为加高了企业跨国进入门槛，还在无形中提升了各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实际上都是逆全球化的重要体现。

最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重新配置，外国直接投资更集中于地缘政治上结盟的国家集团内。IMF 2023年4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里，地缘政治上结盟的经济体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超过了地理位置更接近的国家所占比重，这在半导体等战略性部门表现更为明显，流向亚洲国家的战略性外国直接投资自2019年开始便不断下降。

5. 发达国家“利益优先”的做法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机制

伴随着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塑造了一个相互包容和依靠的全球经济体系，它基于经济最优化配置和商品自由流通构建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极大地提高了全球民众的生活水平和便利化程度。但是其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纵观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存在的现象可知，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因“谁输谁赢”的贸易利益之争而严重分化，尤以美国为甚，其宣称中国从中美贸易上获益，美国却蒙受损失（万广华和朱美华,2021）。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转而寻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

① IMF. 世界经济展望 [R].2023.



得最大收益,“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成为其对外经济合作的宗旨,加剧恶化了其于制造业大国、原材料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美元霸权的形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当美国出现经济困境时,常采用量化宽松(QE)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获利,当美国经济逐步复苏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对称地及时紧缩,而后期突然货币紧缩又会带来资本大规模回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汇率急剧贬值和金融动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资源和能源导致原材料国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Hickel(2022)指出,“并非所有国家都对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恶化负有同等责任,有些国家通过对材料的提取、生产、消费和浪费,人均使用的资源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其研究表明,1970—2017年,全球开采了近2.5亿吨的材料,其中绝大多数由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使用,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6%)对全球74%的过度资源使用负有责任。这些高收入国家主要为美国(27%)和欧盟高收入国家(25%)。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我输你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不断打压竞争对手,获取最大化利益。中国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商品出口的全球占比是4.29%,之后充分发挥制造业强国潜能,向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而美国保持不变,截至2018年末,中国的商品出口全球占比增长到12.72%。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全球率先稳定疫情,使制造业优势进一步放大,2021年底中国商品出口全球占比为15.07%,约为美国的2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出口地位相对下降,美国逐渐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在政府补贴、知识产权等领域指责中国,并采用各种措施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和反思

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三年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势,使得原先积压已久的“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等矛盾被放大,原来经济全球化赖以生存的积极面受到较大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种种困境,探讨其背后蕴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触发因素,以此寻求“逆全球化”阻力的消解之道。

(一) 自由贸易发展困境

事实上,发达国家逐步抛弃了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建立起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等传统自由主义准绳。新冠疫情突袭而至前国际贸易体系已然转向碎片化,全世界已

① 原始数据来源于Wind,经作者计算而得。

有 3 000 多项区域的、双边的投资协议，这些协议缺乏统一的全球性规则。《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9 年度报告》指出，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统计资料，2000—2018 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 1 693 项，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台 169.3 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究其原因，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并非利益中性的，正是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之时拉大了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精英已经在上一轮全球化中获得巨额财富。由于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并占据重要贸易份额，发达国家出于维护自身主导和最大获益主体的心态，集体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成为之前竭力反对的保护主义的拥护者。目前，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在持续减少。数据显示，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看，2019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贡献了一半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9.5%，远超发达经济体的 35.1%。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系统中仍处于主导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仍将会通过利率、汇率、银行信贷、贸易、心理预期、资产价格等诸多方面的传导作用，对全球自由贸易产生负面冲击。

（二）南北发展冲突困境

南北发展冲突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西方世界整体下滑、世界权势加速东移”（蔡昉，2016），这引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普遍焦虑和高度警惕，由此导致南北双方

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这本质上是美国为维持其全球经济首要地位而发起的调整国际经贸利益格局的外交霸凌行为。

面对经济发展困局，美国并未正视国内积存已久的矛盾和问题，自身“低储蓄 + 高消费 + 高负债 + 美元霸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不合理的国内经济政治制度，才是禁锢自身发展的根源（原倩，2018）。相反，美国却将问题的矛头对外，信奉绝对“第一”与“优先”的政策，简单粗暴地干预中美之间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扭曲正常的国际经济行为和秩序，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谢地和张巩，2019）。

站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而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集体性崛起是必然趋势，必然会对国际制度和秩序变革的话语权有重新分配的主张，也必然会带来新问题和冲突（姜安印和刘博，2021）。戈莫里和鲍莫尔（2003）指出，在简化的两国贸易模型中，若贸易大国的贸易份额占比超过 70%，贸易小国占比不足 30%，大国降低部分贸易份额有助于总体贸易福利的改善，达到共赢的效果，但是当两国贸易占比均处于 30%~70% 区间时，两国发生冲突的概率大幅提升，共赢将转向冲突。

（三）全球经济治理困境

全球化发展遭遇“逆风”的根源之一，在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导致其在应对和处理国际纠纷和问题时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是无法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与



单一应对政策之间的冲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十多年, 但是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复苏的手段和方法仍是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式。惯常的方式是, 政府为恢复经济活力和刺激总需求一方面采取财政宽松的政策, 另一方面又极其依赖大水漫灌式量化宽松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从实践效果上看, 这种刺激不仅效果微弱, 还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产生一系列与政策初衷自相矛盾的负面后果, 如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风险、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加不公、增加僵尸企业和延迟经济结构调整等(张斌, 2020)。更严重的是,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 美国“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无论退出还是延续, 都会对全球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冲击(Rey, 2013)。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家间协调机制的缺失, 使得美国能够借助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导权, 最大化发挥利己主义, 扭曲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竞争优先于合作、自利优先于利他的思维下, 世界银行、IMF 和 WTO 等多边经济治理组织形同虚设, 不仅难以对美国“过度特权”形成有效监督和问责, 更使得美元霸权及其管束严重缺失。

(四) 可持续发展困境

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深受新问题和新的挑战的制约。例如, 全球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保护、能源转型与发展、全球恐怖主义等问题, 导致全球化的可持续性面临不确定性。

一是人口问题, 蔡昉(2020)指出人口老龄化从高收入国家蔓延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导致全球性储蓄过剩, 使得消费增长不足以填补投资减少造成的需求缺口, 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联合国发布的《2023 年世界社会报告》指出, 2021 年, 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61 亿人, 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16 亿人, 依据老年抚养比(即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与 15~64 岁劳动人口的比例), 全球老年抚养比已经由 1990 年的 10% 左右快速增长至 2021 年的 14.8%。全球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造成有效需求不足, 并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环境和气候问题。全球气候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并带来新问题, 使得人类社会不断面临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据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统计, 过去 50 年里全球已发生超过 1.1 万起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 造成 200 多万人丧生, 总损失达 3.64 万亿美元。然而, 短期内, 人类仍将不断面临气候问题带来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 承受最大影响的是一些最贫穷和负债最重的国家。更为严重的是, 各国减排承诺或难以兑现, 全球能源结构、粮食价格等也将受到新的冲击。这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通过协调对话与建章立制来解决(蔡拓, 2020), 但目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面临“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 无法为这些全球性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三、经济逆全球化下的中国方案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逆全球化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全球经济仍会继续向前演进，只是这个过程将更加曲折。对于中国而言，亦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凭借传统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并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历程之中，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贡献了“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然而，当下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逆风”，为了有效应对这股“逆风”的破坏作用，并在未来继续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化发展，中国应从以下方面做好应对。

（一）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在基础创新、资本市场方面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在基础创新领域，应加强基础类研发，通过基础创新支撑科技强国。2023 年 3 月 10 日，国家通过了科学技术部的改革方案。新的科技部缩减了项目审批，强化了国家的科技战略规划，强化了重大产业攻关、加强基础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中国的科技发展更多是跟随发达国家，现在则急需支持基础研发和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科研项目。在资本市场上，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高校研

究所基础研究-硅谷应用研究-风险资本投资-华尔街上市”的市场化链条实现。我国通过注册制改革，支持科技企业上市，新兴产业市值占比已经大幅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已经显现。证券发行应该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为主导，当前我国还有很多细分行业处于“卡脖子”阶段，应给这些企业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资本市场更多的支持，并打通“科技-融资-上市”的链条。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模式

内循环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首先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我国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拥有较多的财富，然而这一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需要对高收入和高净值群体进行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两种税收调节。只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把巨大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需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模型（钻石模型）中指出，国家的发展阶段分为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投资导向阶段（大规模产能扩张）、创新导向阶段（激发市场活力）和财富导向阶段（更加强调公平）。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已处于第三阶段，需要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内循环。而且，中国已经具有



良好农业、能源业、制造业和强大的市场, 已经具备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条件。

（三）加快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积极拓展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籍在于深深嵌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当下, 亚洲经济增长逐渐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从实践角度看, 这得益于“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 以及对这些国家国内发展不平衡的改善, 并且这种增长的推动作用随时间逐渐增强, 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在充分尊重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前提下, “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 不仅使中国继续从世界汲

取发展动力, 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这与发展经济学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的使命是高度契合的。世界银行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①, 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提升和改善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重振国际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 我国在产业高端化发展以及技术水平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通过要素关联、投资关联、贸易关联、产业关联等, 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同时, 完成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N]

学术编辑: 曾一巳

参考文献

- [1] 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1):4-23.
- [2]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置身全球“长期停滞”之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9):4-22.
- [3] 蔡拓.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0):4-29.
- [4]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M].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5] 姜安印,刘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的“一带一路”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1(1):105-116.
- [6] 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M].文爽,乔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 [7] 刘坚,陈宝胜.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的生成与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22(02):29-34.
- [8] 渠慎宁,杨丹辉.制造业本地化、技术反噬与经济“逆全球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2(6):42-60.
- [9] 万广华,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J].学术月刊,2020(7):33-47.
- [10] 谢地,张巩.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美贸易战的多重博弈与中国的出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29-149.
- [11] 原倩.萨缪尔森之忧、金德尔伯格陷阱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J].经济学动态,2018(10):50-59.
- [12]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雷达,朱丹,李有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3] 张斌.发达经济体为什么采取宽松货币政策[J].经济学动态,2020(12):28-39.
- [14] 张宇燕.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

① 本报评论员.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N].人民日报,2021-11-21(001).

- [15] 赵磊.新冠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J].当代世界,2021(2):44-49.
- [16] 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08):126-153.
- [17] Bordo M.The Second Era of Globalization is Not Yet Ov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NBER Working paper 23786,2017.
- [18] Carvalho V.From Micro to Macro via Production Network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 28 (4):23-48.
- [19] Hickel J,O'Neill D W,Fanning A L,et al.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cological Breakdown: A Fair-shares Assessment of Resource Use, 1970-2017[J].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2022,6(4):e342-e349.
- [20] Rey H.Dilemma not Trilemma: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R].NBER Working paper 21162,2015.
- [21] Simon J Evenett,Johannes Fritz.The 28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2021.
- [22] Simon J Evenett.Protectionism, State Discri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nce the Onse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2019,2(1): 9-36.
- [23]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M].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2018.
- [24] Walden Bello,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New Updated Edition[M].Dhaka: University Press Ltd.,2004.

Globalization in Revers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Guangting¹ LIU Tao²

(1.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Jiangsu Hengrui Pharmaceuticals Co., Ltd.)

Abstract The world's economy and politics are in a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The old contradictions such as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capital and labor,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have been further amplifi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facing variou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ee trade development, North-South conflicts,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is not only a beneficiary but also a contributor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should reshape momentum behi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esponding to new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art of an effort to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olving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in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Reverse Globalization, Dilemm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10 F18 F41